

◎创作谈

# 爱的升华

关于《回响》的写作

东西



东西  
郭红松绘



《回响》是一部尝试对爱情进行探讨的小说，我想写它想了整整两年多时间。从2017年春天到2019年夏天，我一直在构思，并试探性地写了七八个开头，但都不能让自己满意，甚至想过放弃这个题材。可是，写一部关于爱情的小说又是我多年来的执念，原因既有长期的阅读刺激，更来自于对美好情感的向往。我们这一代人，基本是跟文学作品和影视作品学习恋爱的，尤其喜欢那些表现浪漫纯洁情感的作品。在我的阅读经验里，那些跨年代跨国界传播的小说大都和爱情有关。这是人类普遍的情感，描写它的作品即使使用计算机来统计恐怕也会有遗漏。普遍性题材有个好处，那便是人人都可以写；但也有难题，那便是在众多的前人作品面前如何写出新意？放弃，只是一闪念，迎难而上才是写作的出路。

“推理”是我找到的第一个突破口。2019年秋天，我才下定决心用推理的方式来写这部小说。之前，我曾犹豫，生怕一旦用了“推理”就会把小说写成类型小说，甚至害怕

被情节裹挟而忽略了严肃思考，同时我又担心小说过度严肃会造成读者的流失，这一点已经被无数作品证明。一种是惯性写作，一种是改变写法，纠结犹豫之后，我选择让小说回到传统，让我的惯性写作与类型小说打通。想想，先锋如法国新小说派作家罗伯·格里耶，不是也做过这样的尝试吗？但他写着写着还是进入了“新小说”的轨道。我想来得更彻底一点，让小说不仅有类型的外衣，还要有类型的实质，于是，我便对小说中涉及的一起“大坑案”进行了认真的梳理和推理。主人公冉咚咚作为一名女警察，首要任务就是辨凶手，主持正义，惩恶扬善。这一点她做到了，虽然她经历了重重困难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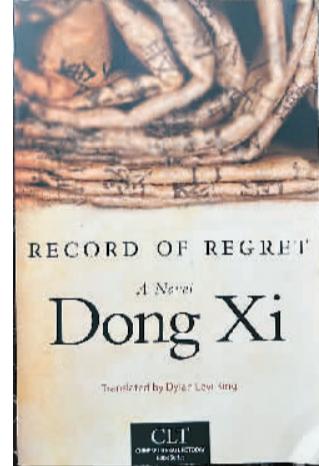
“心理”是我找到的第二个突破口。一直以来，我都在虚心向现实学习，并深感现实远比我的想象丰富。写作必须建立在坚实的生活之上，前人的大量作品都证明了此话的不容置疑，但我又不得不承认：生活有多丰富，心灵就有多丰富。换言之，心灵是现实的镜像，所有的心理反应都是现实的“投射”，写作在向现实开掘的同时也不应该忘记向心灵的深处开掘。改革开放以来，作家们已意识到“向外写”与“向内写”的同等重要，只是现实的过于强大常常拉住我的衣袖，让我无暇顾及更多的内心写作，或者说现实的丰富多彩都还没有写够，让我暂时放弃了内心的写作。然而，这一次，我想把心理的探讨与现实的探讨用同等篇幅呈现，即主人公冉咚咚在推理案件的同时还要推理爱

情。爱情如何推理？为什么要推理？诸多的文学作品都写了单纯的浪漫的初恋，却忽略了生活中还需要切实地面对审美的持久性问题。有的人得过且过，对情感将就，但冉咚咚是理想主义者，所以她要在推理中不断地证实爱情的存在。她对爱情持久性的追问，让我看到了一颗美丽的心灵。只有相信爱情的人，才会追问不止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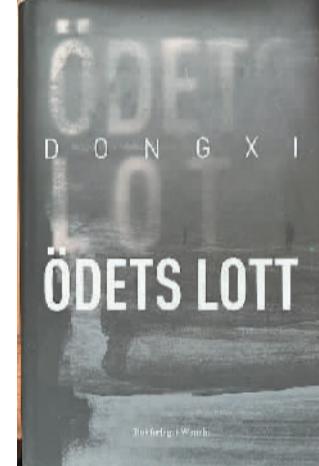
那么，凶手她抓到了，爱情她抓到了吗？答案在过程中。跟着人物一路走下来，我竟多次调整自己的爱情观，没有事先设定，只在写作中逐渐确立，包括人物的观点。主人公从她缉拿的罪犯身上看到了扭曲的爱情观，看到了“被爱妄想症”，于是引起警觉并联想，发现自己同样有被爱的幻想以及对爱的隐秘渴望。自我发现瓦解了她的执念，让她产生强烈的“热爱”，即：因内疚而产生的爱。“没有经过考验的爱情，那不叫爱情。”“所有的‘爱情’最终都将变成‘爱’，两个字先走掉一个，仿佛夫妻总得有一个先死。”这些关于爱情的思考是爱的升华，是人物以及作者的认知开发。因此，冉咚咚最终明白：能过好平凡生活的人才是真的英雄，真正的浪漫都蕴藏在柴米油盐酱醋茶里。

我不仅从我写的人物身上获得了崭新的认知，也在写作中自我成长，并再次相信“爱”能拯救人物，也能拯救作者。2020年底，我完成了小说初稿，2021年3月完成修改，从构思到完工，我花掉了4年多时间。

(作者系广西民族大学教授)



东西《后悔录》英文版



东西《篡改的命》瑞典文版



东西《没有语言的生活》法文版



东西《篡改的命》俄文版

◎新作评介

## 深蕴主体情感的动物叙事

——读《动物文学王国·王族作品系列》

王敏 顾悦

作家王族一直对边地生活中的动物叙事情有独钟，他早年完成的散文《狼界——与狼对视28天的笔记》便体现出主体观照背后的人性思考。其新作《动物文学王国·王族作品系列》（下称“动物文学王国系列”）包括《荒野中的猎鹰》《村庄里的狼》《沙漠中的骆驼》三部作品，是王族在动物叙事方面的又一力作。

王族曾说：“我写动物的过程，其实就是把兽性变成人性的过程。”虽然他在《荒野中的猎鹰》等三部作品中着意表现的皆是边地荒野中生存的动物，但却刻意将其置入一个与小说人物命运息息相关的情境中，形成了叙述主体“面向事物本身，介入到面前的事物当中”的“在场感”。叙述者的在场导致了边地经验呈现的直接性、无遮蔽性和敞开性，最终促使叙述主体在“为动物作传”的凝视中完成自我观照，凸显出边地人物的人格魅力。

动物文学王国系列作品中，作者在对动物的固有特征和本能行为进行叙述时，往往会不自觉地将叙述者立场转换到动物的立场上，反映作者边地生活的生存体验、事物认知以及利害判断，从而对动物展开“以己观物”式的描述。

每部作品目录前，王族为要记述的动物撰写了志书。在这些短小精悍的“动物志”中，作家以细腻的语言详尽描述了动物的习性和生存法则，并在其中加入人的生存体验和认知。作者笔下，机警敏捷、擅长猎杀的狼也有温柔仁善的一面，它在享受猎物时总会留下一点残渣，从而使其他受饿的动物能靠这些残渣渡过难关（《村庄里的狼·狼志》）；温顺的骆驼更有安仁乐义的美德，它没有依仗自己高大的身躯将鲜美的叶子一扫而空，而是主动食用骆驼刺、干草等食物，而将鲜嫩美味的叶子留给其他动物（《沙漠中的骆驼·骆驼志》），这使得他塑造的动物形象具有人的仁心义举。

动物文学王国系列皆以叙述者“我”去新疆边地拜访朋友时所记述的见闻展开。在“我”的际遇中，动物的生存经验总能给人以借鉴意义，为人带来超越生活表面的深层感悟，使人能够从与动物的相处经验中体悟个体的生存之道。

例如《沙漠中的骆驼·缓慢的行走》，叙述者在长期与长眉驼进行沙漠跋涉的过程中，长眉驼缓慢而踏实的脚步使人发现了骆驼成为“沙漠之舟”的奥秘，从而总结出“不怕慢，就怕站”的生存智慧：“跟着长眉驼，你的耐心就得到了最

好的锻炼。沙漠大着呢，不是一天两天能走完的，所以你要学长眉驼，一步一步地走。老人说得好，不怕慢，就怕站，一站就耽误时间了”。再如《荒野中的猎鹰·第一次飞向高空》中，“我”通过目睹小鹰如何适应线的长度，“不急不躁”地在线所规定的范围内自由飞翔的场面，进而领悟到动物为了锻炼生存本领尚且“脚踏实地、稳扎稳打”，人为了追求美好生活更需克服“本领恐慌”而勤勉向上的人生道理。

一如论者所言，动物叙事，恰恰是人的叙事。这其中，叙述主体的情感判断、价值观念、思维方式、情趣兴味等都深蕴其间。王族在动物文学王国系列中，通过将自我认知、自我情感融入叙述者对动物行为的评价中，体悟出边地荒漠的生活真谛，在一幅色彩斑斓的诗意画卷中完成了对人之主体性的在场书写。作品消弭了人与动物的二元对立，以去人类中心化的视角再次借凝视动物而反观自身，具有叩问生命形而上意义的价值。

(作者王敏系新疆大学新疆文化发展研究中心教授，顾悦系该校硕士研究生)



## 兼容文史 会通古今

——评《中国现代旧体诗词编年史》

赵学勇

李遇春主编的《中国现代旧体诗词编年史》（下称“编年史”）第一辑四卷本是中国古典文学与现代文学研究界瞩目的一件大事。从全书纵横交错的结构、不厌其详的史料以及微言大义的述论中，不难看出编纂者已具备相当成熟的个人治学理念。

东汉王充在《论衡·正说》中，提出了“义穷理竟，文辞备足，则为篇矣”的辞章之法，突出了作文赋采的重要性。《编年史》的一大特色是文辞灵动，注重“属辞比事”（《礼记·经解》）的春秋学方法，有意为其论述做减法，从而突出微言大义的述史特色。正如书中《凡例》所示，全本“以征引文献为主，辅以客观陈述”，以兼容并包的眼光择取及评述史料，对以往学界所冷落甚至忽略的保守派文人诗词、民初各派政党诗词及其交往唱酬、以东亚为重心的域外诗词史实、年久失收之现代旧体诗词等，都有相当的关注与公允的论述，从中颇能体察出编者由文入史的治学路径及其古今会通的学术视野。

作为中国文学的治史者，对于文献史料的发掘与辨析乃是研究能力之体现。有关现代文学旧体诗词的研究，长久为学界所忽视，这与该领域文献史料缺乏全面系统的搜集、整理、考辨与分类有关，也使得与之相关的述史工作难以深入展开。作为学科基础性建设的重要工作，《编年史》第一辑的面世，以四卷430余万字的庞大体量，对来源多样、储量丰富且历史跨度较长的现代旧体诗词文本进行辑录汇编，在文献搜集与整理的具体方法上师法古典文献学，讲求“求全兼备，竭泽而渔”，具有别开一格的开创性意义。在此基础上，通过对相关文献史料“事以时序，时以类次”的编年体叙事，翔实地呈现出各时期旧体诗词的自然发展情状，由此可进一步探察现代中国社会文化生活的整体样态，为日后相关研究的深化提供坚实基础。

从《编年史》中可以看出编者义理求善、史识求新的学术志向。作为桐城派代表人物之一的姚鼐曾反复阐述文章“义理”的重要性，推崇“高韵逸气，而议论考核，甚辨而不烦，极博而不芜，精到而意不至于竭尽”（《述庵文钞序》）的境界。李遇春对于现代旧体诗词的搜集与整理也可作如是观。这项工作的根本出发点，在于对旧体诗词

何以入史、怎样入史进行深入思考与探索，而这又牵涉对中国现当代文学史概念内涵与外延的调整与重评。正如编者自述：“我们需要进一步厘清百年来的现当代旧体诗词文献资源，在此基础上重构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叙述的新模式。”《编年史》以现代旧体诗词文本为基础，以新的现代性视角为切入，重新提出、定位并评估了民初革命者旧体诗词、抗战文人旧体诗词、流寓作家旧体诗词以及现代媒介传播视角下的旧体诗词等的意义。从具体的史论到整体史观，《编年史》在打破既有的常规文学史论述的同时，进一步拓宽了学科视野，从而具有创新的大文学史观特色。

清代章学诚有言：“德者何？谓著书者之心术也。”（《文史通义·史德》）任何文学史研究背后，都离不开著者深切厚重的人文关怀以及载道明理的治史信念。面对长期遭到冷遇、遮蔽甚至遗落、散佚的现代旧体诗词等，都有相当的关注与公允的论述，从中颇能体察出编者由文入史的治学路径及其古今会通的学术视野。

《编年史》以古今会通的大文学史视野，拓宽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学科视域；以“垒土成山”的角度，成文献史料搜集之功，对推进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研究具有重要意义。

（作者系陕西师范大学教授）



## 返璞归真的人生哲学

——读毛国聪《九十九个方子》

朱丹枫



门，终身不勤”的对治之法。后世据此总结出“内视反听”的主张，如葛洪《抱朴子内篇》的“欲得恬愉淡泊，涤除嗜欲，内视反听”。

《史记·商君列传》说得更直白：“反听之谓聪，内视之谓明，自胜之谓强。”所谓医生的方子医治肉体的病症，文学是治疗灵魂的药方。从这个角度看，《九十九个方子》是一本叩问生命之门、洗涤灵魂之书。

为营造小说的故事氛围，这本书的封面用红色作基调，加黑白配色，让人联想到人的皮肤肌理、血管、细胞，乃至或狂乱或恬静的心理状态。标准的白色处方签，姓名、性别、年龄、科别、临床诊断、住址、电话等，在书籍封面上传达出某种声音，试图将设计语言与思想意识相融合。大量的留白，特别是处方签左下角的缺失，一行黑色的手写体“九十九个方子”，让人很自然地记起处方的圣洁与温暖、医生的医术和百病的防与治。

小说《九十九个方子》去“P图”，关“美颜”，除“滤镜”，倡导减少欲望、返璞归真、抱朴守一、顺势而为的生活观念和简单知足的生活态度，这是毛国聪想通过这本小说表达的。唯有超越望闻问切之“有”，才能达到天使人心之“无”，获得生命的真正自由和快乐。当人们在历史和现实的镜片中看到更多美好，相信对于人生、对于未来，也多了些勇气和力量。